

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

On the Female “Xiangchou Utopia” and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in Tie Ning’s Novels

杨东篱（Yang Dongli） 王杰（Wang Jie）

内容摘要：铁凝的小说将时代与历史的具体议题与人类文明的宏大主题有机融汇，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人性异化。与同时期的女性作家相互呼应，铁凝也尝试借由女性“乡愁乌托邦”应对上述困境，并以此为基点探究中国审美现代性。女性“乡愁乌托邦”凝结着女性主体对田园诗性过往的追忆与憧憬，构成变革现实的精神动能。它所体现的中国审美现代性，既是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理想及其当代重建的审美表达，也涵盖了这一进程中女性自由解放的审美诉求。

关键词：铁凝；女性；乡愁乌托邦；人性异化；中国审美现代性

作者简介：杨东篱，山东大学历史学院长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史、文化创意产业；王杰，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求是”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当代美学问题。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项目批号：22JZD00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Female “Xiangchou Utopia” and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in Tie Ning’s Novels

Abstract: Tie Ning’s novels organically integrate specific issues of their era and history with grand them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reby profoundly revealing human alienation with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dialogue with other female writers of her time, Tie Ning also attempts to counter these dilemmas through the female “Xiangchou Utopia,” using it as a launching point to explore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The female “Xiangchou Utopia” encapsulates the female subject’s nostalgic remembrance and yearning for an idyllic past, constituting a spiritual impetus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reality. It embodies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as both an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ocialist ideal and its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and an aesthetic articulation of the quest for female freedom and liberation within these processes.

Keywords: Tie Ning; female; Xiangchou Utopia; human alienation;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Authors: Yang Dongli is Long-term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Email: yangdl77@163.com). Wang Jie is “Seeking Truth”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Lectur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0, China). His research covers Marxist aesthetics, aesthetic anthropology,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 issues (Email: wjie5710@126.com).

铁凝自创作伊始至今，共发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100余部，以及散文、随笔等作品逾400万字。其小说代表作包括早期的《哦，香雪》《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中期的《玫瑰门》、三垛系列（《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高峰期的《大浴女》以及后期的《笨花》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为铁凝创作的早期阶段。此期作品以细腻、真挚、透彻而自然的书写，讴歌人性中的纯洁、天真、勇敢与深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为中期阶段。早期作品中一闪而过的复杂人性在此期得到深入挖掘与反思。铁凝倾向于采取“文化寻根”的书写策略，从日常生活中微观权力的博弈入手，刻画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人性复杂性。高峰期大致介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期作品中那种在历史转型缝隙中对人类原始生命力未经雕琢的汹涌释放，至此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聚焦于日常生活层面的心理权力的隐晦争夺。21世纪初至今为后期。高峰期所见细腻、隐晦且贴近现实的心理书写在这一阶段被有意弱化，铁凝的关注转向对时代与社会转型的冷静观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生活细节出发，探寻人类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支撑。具体到中华民族，则体现为支撑民族主体性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情怀。

铁凝四个时期的创作将时代、历史议题与人类的宏大主题熔于一炉：一方面在时代与历史的演进中反思人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人性的嬗变与相关问题的处理反向勾勒时代与历史，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人性异化问题。其深层旨趣实为尝试以女性“乡愁乌托邦”的方式回应并求解

上述问题，在这一女性“乡愁乌托邦”¹的思想基底上探索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可能路径。²

一、精神家园的失落：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人性异化

铁凝四个时期的小说在主题推进上彼此呼应、层层深入，最终形成一个关于她对时代、历史与人类宏大主题之体验与反思的完整闭环。在其创作中，可见四类人性异化，分别对应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四个标志性阶段。

作为人性异化的一种核心形态，残忍与野蛮根植于战争这一非常态。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战祸频仍，外侮与内战交错延宕，持续摧毁了民众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秩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虽竭力维系日常生活与人性的美好，但战争对感官、心灵及生存环境的破坏无可避免。它颠覆了文明的根基，将人际关系推至生死存亡的极端境地。当法律与道德失效时，个体只能诉诸原始的肉体对抗以求生存。在此过程中，强者常无情施加暴力于弱者，借以宣泄战争带来的恐惧与绝望，由此催生出战争特有的残忍野蛮之人性异化。铁凝小说（如《棉花垛》《笨花》）便集中书写了抗日战争背景下此类异化现象。

《棉花垛》是铁凝的“三垛”系列之一，其中对乔惨烈结局的描写凸显出了战争中残忍野蛮的异化人性。乔从小就生命力旺盛，而且对时代有着敏锐的感知。长大后，她蓬勃的生命力在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中得到了释放：她参加革命夜校，担任妇救会会长，参加脱产运动，进入革命队伍。然而，乔

1 本文使用的“乡愁乌托邦”是王杰提出的审美概念，意指通过对过去的怀念构建起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一概念诞生伊始就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紧密相联，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美学概念。对于该概念的英文翻译曾有“Nostalgia utopia”“Homesickness utopia”等，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该概念的实际内涵。“Nostalgia utopia”也被译为“怀旧乌托邦”，是17世纪中期一位名叫侯佛的瑞士医生在医学论文中提出的描述精神疾病的神经医学概念，指的是因强烈思念之情起于大脑传至全身，进而引起恶心、反胃、心律不齐等不良生理反应的疾病，患者常是背井离乡的人群。后来“Nostalgia utopia”从医学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等多种学科领域，演化成为一个社会、人文研究概念。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将“Nostalgia utopia”解释为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具有某种消极意味（参见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18-40页）。这与王杰强调的通过对过去的怀念积极构筑未来理想社会的乡愁乌托邦概念在内涵上具有明显差异。“Homesickness utopia”中的“Homesickness”意指思乡病，同样具有否定和消极的意味，不适合用来翻译王杰的“乡愁乌托邦”。因此，本文将“乡愁乌托邦”直译为“Xiangchou utopia”，以凸显该概念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以及与“Nostalgia utopia”“Homesickness utopia”等译法的区别。

2 虽然铁凝本人并没有明确说明她创作的理念是“女性乡愁乌托邦”，但铁凝的创作理念与王杰“乡愁乌托邦”及其中体现的审美现代性有着深刻的契合。王杰对这一点有着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优秀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未来”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乌托邦观念，而是可以感受的具体存在，虽然它还不普遍，但已经是可感受的存在，比如在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尹小跳在经过几种不同类型的爱情遭遇之后，获得了精神境界的升华（参见 王杰，“审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与当代文学实践”，《文艺研究》4（2000）：9-13）。

在一次回村活动时被日本警备队抓住并惨遭轮奸和虐杀。日本兵对这位可爱少女的极端暴力突显了战争对人性的系统性摧毁。这实际是将自身对战争与死亡的恐惧和绝望，投射并倾泻于乔，这位被彻底符号化并沦为宣泄工具的少女身上。他们企图通过虐杀重拾虚幻的内心平静。这种残忍野蛮的人性异化，既体现了日本人自身的异化，也体现在他们对乔的异化上。与乔生命发展的自然通透相比，残忍野蛮的人性异化更显其惊心与可怖。

第二种类型的异化人性表现为僭越的解放。与中国百年战争共生的是中国女性的解放意识。近代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为人类带来了普及性的教育、可以独立承担的工作以及相对充裕的休闲时间。这使得女性也有机会获得人格上的自主与独立。然而，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被社会普遍认同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当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还普遍秉持着对女性的传统认知。所以，许多已经觉醒的女性仍然继续陷入依附性的框架中以求生存。然而，在持续压抑女性独立、自主的旧环境与旧制度中，萌发的女性解放意识必然催生反抗。但迫于传统社会强大制度机器的钳制，这种反抗只能隐秘、缓慢地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向外渗透。虽然如此，它却拥有巨大的强度，经常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方式出现。因此，在现代性进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反常的女性行为。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很多女性会以异化人性的方式做出反抗。铁凝将这种被异化的女性反抗写在了她的《麦秸垛》《玫瑰门》等小说中。

《玫瑰门》里的司猗纹年轻时被父母送去教会学校，受到了现代文明观念的洗礼，萌发了女性独立自主的解放意识。然而，自由恋爱的失败、包办婚姻的不幸再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这种女性解放意识没有在现实中健康、正向地发展，而呈现为了一种僭越的形式。比如司猗纹半夜里跑到公公房间强奸公公，用自己鲜活的身体去亵渎旧式大家族的统治者，通过这种“胜利”来发泄内心压抑变形的情欲。这种扭曲变态的解放意识在后来司猗纹再度追求新生活失败后就演变成了对周围环境和周围人无厘头、无理性的敌视和报复，比如她窥视儿子和儿媳的房事并开心于儿子的性无能；她因怀疑孙女苏眉与叶龙北关系暧昧，竟以70岁高龄一路跟踪两人到了香山山顶。类似的情节不一而足。

《麦秸垛》里的大芝娘与司猗纹不同，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建国后弥漫在时代中的革命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她。大芝爹参军后移情别恋，向大芝娘提出离婚。大芝娘当即一反平时的唯唯诺诺，强行与大芝爹发生性关系有了大芝。这也是在女性解放意识的感召下挑战男权的例子。不过，大芝娘的解放意识并不纯粹，其中掺杂更多地是枉为人妇的求补偿心理。当然，也不能否认女性解放意识在其中的刺激作用。只是这种刺激对于没受过教育又没摆脱封建宗族血亲观念的大芝娘，激发的是对封建男权非理性的反抗。但令人深思的是，大芝娘的“反抗”也“成功”了。

无论是司猗纹，还是大芝娘，她们确实是在直面男性压迫进行反抗，但她们是在通过被封建宗族血亲观念控制的个人私欲来理解这种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将自己异化为一己之私向男性复仇的工具。她们并不是没受到现代女性解放意识的洗礼，但这种洗礼对她们的影响并不彻底。她们激烈但变态的“反抗”突出反映出现代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曲折发展。

第三种类型的异化人性表现为心灵的扭曲。中国社会在观念上的现代性转型是漫长而曲折的。中国观念的现代性萌芽于清末民初，文化层面对西方人文书籍的翻译、制度层面对新民主组织机制的探索、民众层面对各种外来娱乐游艺的引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社会观念的现代性转型。然而，不同国家的对华侵略强行斩断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建国后，社会趋于稳定，转型得以继续，但“文革”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人性异化。“文革”启动的初衷虽包含解决观念现代性转型问题的意图，但其后续发展逐渐失控，反而导致了传统观念对现代性观念的激烈反噬。个体在观念激烈对立的洪流中，承受不住时代转型的重压，陷入无端的迷惘与恐惧。这种迷惘与恐惧在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条件下爆发出来，反而以极度兽性和野蛮的方式，对人类个体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反现代性戕害，凸显了心灵的扭曲。铁凝对这种异化人性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大浴女》等小说中。

《大浴女》刻画了在女主人公尹小跳人生中连续出现的心灵扭曲的人物群像：有对唐菲母亲唐津津施暴的红卫兵、一生不断作践自己的唐菲、仅仅为了逃避劳动就与医生偷情的尹小跳的母亲章妩、蓄意害死同母异父妹妹的尹小跳和尹小帆。此外，格外喜欢夸张与女人关系的尹小跳的情人方兢、深夜用锥子刺人的方兢的老相好、通过击垮妻子意志与自尊来寻找男性自尊的尹亦寻，也都是心灵扭曲的异化人性的代表。

第四种类型的异化人性为欲望膨胀。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时期，90年代的商品化浪潮冲击了社会各阶层，观念上表现为追逐无节制的金钱利益（或物质利益）并采取极端手段，导致社会一些领域出现了贪欲滋生、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进而形成欲望膨胀的异化人性。铁凝在《无雨之城》等小说中对此做出了描写。

《无雨之城》中的每个人都有着隐秘而膨胀的欲望：自己贺只是小单位的普通科员，却想让女儿进入上层社会的贵族学校；自己贺的老婆为了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与意大利人私奔；陶又佳因为想做市长太太而做了已婚的普运哲的情人；普运哲已垂垂老矣，却想抛弃发妻娶年轻漂亮的陶又佳；葛佩云明明与丈夫普运哲没感情，却为了市长夫人的名分死守着死水一潭的婚姻；普运哲为了做稳代市长并获得更好的仕途，又抛弃了陶又佳。这一系列人物的选择与行为，暴露了他们内心隐秘而膨胀的欲望。这些欲望的背后，是商品化大潮对传统道德观、价值观的冲击与破坏，反映了价值皈依缺失带来的空洞与迷惘。

二、女性“乡愁乌托邦”、审美现代性与人性的出路

在铁凝的小说中，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人性异化集中体现在残忍的野蛮、僭越的解放、心灵的扭曲、欲望的膨胀等四个方面。这些异化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以机器逻辑、物化逻辑隔离人与自然、疏离人际关系的现实，也揭示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社会转型中普通人的艰难与痛苦。

“乡愁乌托邦”将乡愁的情感与乌托邦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意指通过对过去的怀念构建起未来的理想图景。这一概念诞生伊始就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紧密相联。乌托邦是西方学界描述未来社会制度和人类合理生存状态的概念。20世纪初，经由《新青年》杂志的译介，乌托邦与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一同传入中国，开始了其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乌托邦在现代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不过，由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独特的方式和路径。

这种特殊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往往以‘乡愁’的形式，以回旋性回归作为它的表达机制来获得其表达。

（王杰，“乡愁乌托邦” 10）

在中国文化中“乡愁”是一种特殊的感觉结构，指‘身土不二’被打破之后对失去了的美好的田园般的过去的回忆和向往。“乡愁”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韵’或‘神韵’有着某种‘家族相似’的关系，但是又有所不同。“乡愁”是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以后才出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它与现代都市的出现、与现代工业的出现相联系，也包括与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相互对立相联系。‘乡愁’不同于简单的‘怀旧’和‘怀乡病’，它具有一种将‘过去’乌托邦化的强烈情感色彩。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将充满痛苦的现实通过转向过去、转向美好的田园而实现的优美化，‘乡愁’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乌托邦冲动的一种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学形式。（王杰，“‘乡愁’中的乌托邦” 79-80）

乡愁乌托邦首先是中国性的，其次是可以抵达的，也是有未来的，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去实现的。¹这种美学形式把中国传统中的乡土性视为深植于国民情感结构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以乡愁乌托邦的形式，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对中国人的心理具有治愈和引领作用。乡愁乌托邦的审美意义和社会意义都是流动的。²流动的乡愁乌托邦会呈现出多种形式和变体，女性乡愁乌托邦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女性乡愁乌托邦

1 参见王杰、向丽：“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思想战线》6（2022）：127-134。

2 参见王杰、向丽：“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思想战线》6（2022）：127-134。

是乡愁乌托邦与西方女性乌托邦融合的产物，它充分展示了中国本土女性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觉醒意识与自主意识。

西方的女性乌托邦又被称为女托邦。女托邦将乌托邦视为女性主义的根本精神，认为女性能够借助公共的、集体的文化经验，形成超越时间、空间和世俗藩篱的女性共同体。¹以这一共同体为主体构建的未来社会图景就是女托邦。女托邦强调种姓平等、性别平等，强调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强调通过立法和执法来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它总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文学写作被表达出来，是一种“被存在的社会所压抑的冲动和灵感”（参溪 152）。

中国的女托邦主要体现为乡愁乌托邦与西方女性乌托邦的融合。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先驱李小江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是因为中国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早已建构起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性别制度，性别观念判然有别：‘阴 / 阳’互为本体相依而存，男女在本质上不是从属关系。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女性价值体现在各种‘关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第二性 / 女性’”（《史学的性别》177）。中国的女托邦不强调女性与男性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针锋相对，反而更强调一种从自然本性出发的男女关系和谐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自然而然地具有了乡愁乌托邦的特点，即将富有田园生活特色的传统乌托邦化。而与乡愁乌托邦不同的是，中国式的女托邦更强调女性在建构基于自然本性的男女关系和谐之理想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中国式女托邦也可以被称为女性乡愁乌托邦。

女性乡愁乌托邦是乡愁乌托邦在女托邦语境中的变体。它指的是女性通过对过去的怀念构建起未来的理想图景。女性乌托邦会将具有田园生活特色的“过去”加以女性化的解释，体现出与自然具有强烈感性关联的母性与妻性的特点，在感性、温暖、亲近自然的解释中帮助异化的人性弥合分裂，使本能、欲望、情感、理性、精神、理想等人性内在的要素在结构上保持平衡，塑造人性整体的和谐，治愈人被撕裂的内心。现实中出现的残忍的野蛮、僭越的解放、心灵的扭曲、欲望的膨胀等人性异化问题这样就会被缓解。就此而言，女性乡愁乌托邦不失为解决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人性异化问题的出路。

新时期中国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都活在自己自主意识构筑的世界里。她们力图通过发自自然本性的感情如男女之爱、母子之爱等建立一个平等、和谐、自由的生存环境，将此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方方的英芝拼了命也要“盖间房子出来让你们看看”（方方 205），“一定要让自己过好日子，没有人打我没有人骂我没有人给我翻白眼，我就用我女人的力量和本事来养活我自己”（方方 253）。这一叙述典型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乡愁乌托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女性追寻理想的方式多数显得极端，但

1 参见 Brenda Tooley, *Gender and Utop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in Eighteenth French Utopian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2007, 2.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她们的追寻却具有推动文化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解决人性异化问题的积极意义。

与其他新时期中国女作家塑造的角色相似，铁凝作品的女主角们也怀揣乡愁乌托邦的理想，内心朝向理想前进。然而，铁凝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却与新时期女作家塑造的大多数女性角色不同。她们大多不以直接的行动去反抗和纠正现实中因新旧观念冲突引发的人性异化，而始终以观察、反思现实的姿态出现。这种观察与反思通常是深刻的。她们甚至将自身设为观察与反思的对象，不断揭示自己身上被异化的人性，启动内心的精神革命，对其进行批判，直至在观念中建立起现代性的价值观，达到内心的和谐、平静。《玫瑰门》中的苏眉、《大浴女》中的尹小跳、《笨花》中的同艾等都是如此。

这种观察、反思、批判与重建通常通过两个角度进行：一是否定传统，建设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感觉结构和社会秩序，比如《玫瑰门》中的苏眉、《大浴女》中的尹小跳等。在她们看来，现实中的人性异化常被归因于传统和前辈，所以她们尽可能地通过规避传统，走向自己理解的现代性来寻求心理支撑：尹小跳走进了西式的心灵花园，苏眉生下了新生命，尹小帆嫁给了西方人。二是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华，努力以传统文化精华为基础重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性秩序，比如《笨花》里的同艾。虽然同艾与苏眉、尹小跳等女性一样，属于社会、历史的观察者，但她身上却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如包容、含蓄、坚强等。铁凝似乎想要读者明白，建设现代性的感觉结构和社会秩序，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抛弃传统。

不过，在铁凝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以行动投身革命的“女斗士”，比如《棉花垛》中的乔、《笨花》中的取灯等，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是最终在肉体上被异化的人性吞噬与毁灭。这种牺牲是悲壮的，凸显了现代性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也凸显了女性独立、自主的革命身份与革命理想。

铁凝的女性乡愁乌托邦无疑在从传统走向现代性的当下历史过程中明确而典型地体现了审美现代性。“乡愁乌托邦是审美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正是在于它最终能够指向乌托邦的本然存在。乡愁乌托邦究其根本，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王杰 向丽 132）。“乡愁在过去未来两端游走，如果缺少比较明晰的批判精神，就只能是一种圆润的哲学或者仅属于理念形态的美学精神，就没有办法突破乡愁单向度的限度”（王杰 向丽 132-133）。因此，乡愁乌托邦实际上还体现了对于传统的批判。这一点在理解乡愁乌托邦时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带有批判传统色彩的乡愁乌托邦在不同的语境拥有不同的表征方式，找到它的具体性就有可能寻见其未来。在铁凝等新时期女作家的小说中，乡愁乌托邦就体现为女性乡愁乌托邦。不过，在铁凝小说中，女性乡愁乌托邦又被具体化为一种观察、反思、批判与重建的女性乡愁乌托邦。总起来说，铁凝的女性乡愁乌托邦突出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小说的女主人公提供了对传统与现实不掺杂主体意识的客观观察。如前所述，铁凝小说的女性乡愁乌托邦可以分为否定传统重建现代秩序的乌托邦，以及以传统精华为基础重建富有本民族特色现代秩序的乌托邦两种形式。无论是哪种形式，其中的女主人公对传统与现实的观察都体现出了不掺杂主体意识的客观观察。《玫瑰门》中的苏眉虽然被母亲抛弃，被外婆、姑爹粗暴干涉，在大杂院里没有友谊和温暖，但她并没有因此带上有色眼镜去看母亲、外婆、姑爹和大杂院里的其他人，而是尽量不对这些人产生主观情绪，在见识到令人震撼的人性丑恶后还依然选择热爱自己的家族，并努力将家族的血脉传承下去。《大浴女》里的尹小跳比苏眉更客观，她并不排斥自己对身边人产生情绪，比如她幼年时讨厌妈妈跟唐医生的私生女尹小荃，面对情场老手方兢情窦初开，对闺蜜唐菲既欣赏又妒忌，但她最终却能摆脱此类情绪的裹挟，以理性的视角审视自身、这些个体及其与自身的关系。《笨花》里的同艾则是既有客观视角又有母性的包容和坚强。原配丈夫暗中迎娶侧室以及不幸离世，这对于任何女性来讲都是惊天动地、痛不欲生的大事，但同艾并没有彻底沉湎于情绪，而是在短暂情绪波动后迅速调整自己，做出很理性的决定，“语调平和得又如同往常”（《笨花》 456）。在她的客观、冷静、包容与坚强中可以看到强调坚强、和谐、家族凝聚力的中华传统文化给与人个体的力量。

第二，小说的女主人公以感受而不是思考来反思传统与现实，这种反思通常表现为意识流的形式。《玫瑰门》中的苏眉在外婆带她参观了位于响勺胡同的外婆原生家庭豪宅后，对于家族的历史、现实以及自己与身边人的关系都有了自己的理解，但她不能够，或者说她不愿以理性且条理清晰的方式阐述其理解，而是以女性特有的感受呈现出来。尹小跳对异父妹妹尹小荃的死亡一直心存愧疚。对尹小荃死亡的反思在尹小荃死后一直如影随形地伴着她。每当她遭遇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时，尹小荃的死就会浮现出来，拷问她的心灵。此外，《笨花》中的同艾在与丈夫分离多年后又团聚。当时她并不知道丈夫已经偷娶了二房，但直觉上觉得丈夫跟自己的相处跟以前有些不同。她当时的理解也表现为意识流的方式。

第三，小说的女主人公对传统、现实和自我的批判也不呈现为思考，甚至也不仅呈现为心理活动，而主要通过行动来表现。比如苏眉五岁刚到婆婆家时，便以各种顽劣行径表达对父母将她送来的不满。当婆婆主观上为苏眉的妹妹小玮节食时，她便以摔碗之举表达批判。然而，最终苏眉还是通过生育女儿与家族达成了和解，也完成了对自我内心的救赎。尹小跳童年时的临时起意导致尹小荃坠井身亡，她对自己的拷问最终都落实为行动，比如她无意识间靠近尹小荃的表姐唐菲，成为她最好的闺蜜。唐菲去世后，她还努力去帮助唐菲确认唐菲的亲生父亲。《笨花》中的同艾也是如此，确证丈夫向喜背着自己偷娶了二房后，同艾虽然一开始无法接受，但她最后行动起来，用

豁达的心胸、宽厚的风度和雷厉风行的手段处理了丈夫这件不光彩的事，维持了自己和家族的尊严，也间接批判了丈夫。

第四，虽然小说的女主人公主要通过行动来实施批判，但她们在观察、反思与批判后对乡愁乌托邦的重建却是心理式的。她们由此回归了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当然，她们各有各的乡愁乌托邦：苏眉所代表的，是以家族血缘亲情为纽带、亲人之间彼此理解与信任的乌托邦。尹小跳代表的乌托邦则是以爱和原谅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彼此能够提供温暖和宽容的乌托邦，里面有尹小荃、唐菲等：“她拉着她自己的手一直往心灵深处走，她的肉体和她的心就共同沉入了万籁俱寂的宁静”（《大浴女》 306）。作为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女性，同艾的心理活动显然没有苏眉和尹小跳那样丰富，但她的乡愁乌托邦也同样动人：在得知丈夫向喜去世后，“这天晚上，同艾枕着向喜的四蓬增包袱睡觉，她摩挲着她亲手织的这个包袱皮，计算着它离家的时间”（《笨花》 456）。同艾心中的乡愁乌托邦自然是年轻时和丈夫在家乡恩爱生活的那个世界。那时，日本人还没入侵。这个乌托邦以男女情爱为纽带，是一个充满了爱情、乡土气息与生命活力的世界。

三、铁凝式审美现代性的特色

铁凝小说的乡愁乌托邦是观察、反思、批判与重建的女性乡愁乌托邦。她的观察是尽量不掺杂主体意识的客观观察；她的反思是通过意识流感受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她的批判是以行动而不仅仅呈现为心理活动，更不呈现为理性思考；虽然铁凝小说的女主通过行动对现实和自我进行批判，但她们对乡愁乌托邦的重建却是在心理层面。这种重建使她们在现实中回归了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们设计的人类社会的改造工程，从总体上可以被理解为是“人类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性转型”（王杰，“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论纲” 5）。审美现代性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人类社会实践场域的结构性转型”。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有三个基本维度：“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当代重建”（王杰，“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论纲” 8）。铁凝式“乡愁乌托邦”无疑集中探讨的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其中隐约可以看到在认同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目标的基础上建设审美现代性的倾向。她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的女性“乡愁乌托邦”的情感反应和审美表达构造了铁凝特色的审美现代性。

相对于其他新时期的中国女作家，铁凝式审美现代性体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特色：首先，与新时期其他女作家塑造的直面传统与现代意识斗争，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女主人公不同，大多数的铁凝女主人公并不执着于用自己的现代意识与传统进行激烈碰撞，而更多采用了内省、观察与在精神层面寻求和解的路径来应对现代性的冲击，展现出了另一种重要的生存智慧和情感深

度。苏眉一直被婆婆司猗纹实施隐形的心理虐待，但她坚强地默默承受，基本没有正面反抗。脱离苦难，走向乡愁乌托邦的方式是婆婆的自然死亡和自己的自然怀孕生产。尹小跳讨厌妈妈章妩出轨，讨厌妈妈因出轨生的私生女尹小荃，但她从未直接向妈妈表达不满，最激烈地反抗就是联合妹妹尹小帆，不提醒尹小荃，使其坠井身亡。同艾面对传统的不合理和丈夫的移情别恋也采取了同样隐忍的态度。除苏眉、尹小跳、同艾外，《永远有多远》里总被发好人卡的白大省、《无雨之城》里发现丈夫出轨的葛佩云也都是如此。这些女主人公之所以不直接面对新旧观念的冲突和现实的激烈矛盾，就是因为她们不愿破坏已有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试图寻找到和平应对现代性冲击的方式。这也反映了铁凝内心面对现代性转型的思考，她既希望时代能够尽快建立起现代性的价值观与社会秩序，又希望在这一过程中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由此体现出在特定历史阶段观念转型过程中的张力与复杂性。

第二，铁凝的女主人公在反思历史转型期的现实问题时，用的是意识流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思考。相对于深入探讨现实问题背后宏阔的历史原因，她们更侧重通过感性经验与意识流手法进行深度内省。苏眉对于司猗纹以及大杂院里其他人的奇怪表现从不进行理性反思，也不将这些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他们在历史转型期的个人身份。尹小跳也是如此。面对章妩的出轨，唐老师被逼吃屎、唐菲被迫卖淫、方兢浪荡成性、陈在犹犹豫豫等系列悲剧，尹小跳的感受并不触及在它们背后隐藏的女性抑或男性个体追求独立意志的现代性意识与传统教条道德观念的激烈冲突。就连尹小荃的死亡，她虽然反复拷问自己却也只是在情感层面愧疚。同艾虽然伤心于丈夫移情别恋，但她并不理性反思丈夫为什么这样做，而是将此当作了女人的宿命。

第三，铁凝的女主人公对于传统、现实与自我的批判有时会呈现为心理活动，但更多以非理性的方式体现。她们的行动式批判常带有个人化与非理性色彩，侧重于个体救赎，其乌托邦重构主要发生在精神世界层面，比如苏眉用摔碗的方式批判婆婆让妹妹节食。尹小跳用与唐菲成为闺蜜的方式批判童年时致死尹小荃的自己。同艾用回老家的方式批判丈夫背叛自己等。

第四，铁凝的女主人公对乡愁乌托邦的重建都是心理层面的，主要体现为使自己个人回归内心的平静与自由。乡愁乌托邦并不只是一种心中的理想，它不仅存在于观念中，更能通过人的努力积极参与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敦促人们改变现实，推动时代前进，进而实现它的治愈和引领作用。铁凝的女主人公对乡愁乌托邦的重建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直面传统弊端进行反抗，但它以启发内省，积极塑造个体内心的方式同样积极参与到历史的现代性进程之中，也是具有独特价值的。苏眉在产房生女儿时，在心中完成了以家族亲情为中心的乡愁乌托邦的建构，这使得生育在她心中变得很神圣。尹小跳与陈在分手后，在回想往事中建构了以爱和原谅为纽带的乡愁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她想象所有她爱却伤害过的人依然爱着她，并且彻

底原谅了她的过失，虽然她内心的这份“甜蜜”仍伴随着痛苦。同艾虽然内心活动不像苏眉和尹小跳那样丰富，但她那充满了爱情、乡土气息与生命活力的乡愁乌托邦也给战争中的人们提供了坚强面对现实的心灵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他们战胜敌人，重建家园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审美现代性视域下女性“乡愁乌托邦”再思考

“女性”主要指女性主体意识。李小江指出：“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女性的自我认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灵魂，这就是女性主体意识”（“新中国／新生代女性的‘前世今生’” 104）不过，这种主体意识并不是与男性对立的，而是能够与男性主体意识和谐交流，和平共处的，这是天生的：“作为类人，男人或女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她）的本质属性不在任何单一性别范畴里，只能在相互“关系”中被界定；其“属人的本质”不是对自然的超越，是自然的本质“最自然”的体现”（李小江，“谈谈‘女性／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 4）。马克思对女性主体意识亦有过探讨。他认为，同一阶层的男性和女性应该有共同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目标：“德国妇女应当从推动自己的丈夫去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开始”（马克思 恩格斯 570）。也就是说，女性积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支持和投身于阶级斗争或民族革命队伍，男性则应支持妇女解放。女性可以在自己自由意志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变革世界，并在变革世界的行动中与男性自然达成两性关系的和谐。这证实了李小江对男女关系理解的合理性，并比李小江对女性的理解展示出更多的深度。因此，在谈论女性问题时，应该把女性放在与男性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谈论，凸显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特色。可见，铁凝通过内省、观察与在精神层面寻求和解来勾勒女性主体意识的路径，在历史现代性转型时期具有独特价值。

由上可见，女性乡愁乌托邦应该也是能够变革现实的精神力量，只不过这种精神力量蕴含了女性主体对富有田园气息的美好过去的回忆和向往。在这种回忆与向往中，女性能够体现自己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主体意识。这种带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对过去美好田园的回忆与向往也是深植于国民情感结构的文化基因，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情感感染力。相对于男性乡愁乌托邦对人类社会生活心理的引领，女性乡愁乌托邦更倾向于对人类社会生活心理的治愈。无论是引领还是治愈，都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积极参与。治愈会使人类的精神更强大，进而积极介入并改造现实，推动时代向前发展。

这样，女性乡愁乌托邦体现的中国审美现代性就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当代重建的审美表达，还有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女性自由和解放的审美表达。在我国文化与社会现代性转型中出现的女性自由和解放完全可以通过不极端的行为，比如带有母性色彩的温暖而治愈的方式来趋近女性自由和解放的目标。过于激进的行为反而丧失了女性乡愁乌托邦作为标志的治愈性。将乡愁乌托邦以女性的姿态合

理嵌入到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当代重建的现代性发展中去，同样可以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进而帮助人类积极介入现实，以实际行动推动时代发展，更快实现现代性建设的目标。就此而言，铁凝小说中的女性“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构成了中国审美现代性光谱中不可或缺且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Works Cited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Boym, Svetlana.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translated by Yang Deyou.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0.]

方方：《方方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Fang Fang. *Selected Works of Fang Fang*.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2.]

李小江：《史学的性别》。西安：陕西师大出版总社，2024年。

[Li Xiaojiang. *Gender in Historical Studies*. Xi'an: Shanxi Normal UP, 2024.]

——：“谈谈‘女性/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对‘女性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山西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2020）：1-7。

[—.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Issues of ‘Women/Gender Researches’—Critique on Critique of ‘Female Essentialism.’”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20): 1-7.]

——：“新中国/新生代女性的‘前世今生’”，《山西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8）：103-106。

[—. “The‘Past and Present’ of New China/New Generation Women.”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2018): 103-10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6,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参溪：“跨文化的女性主义乌托邦研究——武庆云博士《中国和英语文学乌托邦中的女性作用》一书推荐”，《中国比较文学》1（1996）：152-156。

[Shen Xi. “Research on Cross Cultural Feminist Utop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1 (1996): 152-156.]

铁凝：《大浴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年。

[Tie Ning. *The Bathing Women*.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笨花》。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

[—. *Clumsy Flower*.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9.]

Tooley, Brenda. *Gender and Utop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say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Utopian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2007.

王杰：“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理论结构论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1（2023）：5-16。

[Wang Jie. “Outline of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2023): 5-16.]

——：“‘乡愁’中的乌托邦”，《上海艺术评论》6（2016）：79-81。

[—. “Utopia in ‘Xiangchou’.” *Shanghai Art Review* 6 (2016): 79-81.]

——：“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探索与争鸣》11（2016）：4-10。

[—. “Xiangchou Utopia: The Chinese Form of Utopia and Its Aesthetic Expression.”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11 (2016): 4-10.]

王杰、向丽：“乡愁乌托邦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王杰教授访谈录”，《思想战线》6（2022）：127-134。

[Wang Jie and Xiang Li. “Nostalgic Utopia and Chinese Aesthetic Modernity: An Interview with Wang Jie.” *Thinking* 6 (2022): 127-134.]